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 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 驱动机制、特征和影响

吴纪远

摘 要：近年来，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崛起与跨国协作已成为冲击欧美政治秩序与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变量。尤其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呈现显著升级态势。美国右翼不仅在移民等议题上与欧洲右翼民粹力量形成共振，更在欧洲一些国家大选前的敏感时刻直接介入其内政，引发欧洲主流建制派的强烈反弹。本文聚焦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对欧洲内政的干预，探讨当代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驱动机制、特征及其影响。研究显示，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势力的互动是一种技术资本权力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深度融合的跨国动员范式。该模式通过构建私人化、去制度化的网络架构，依托科技右翼主导的数字平台，推动右翼本土主义议程的全球扩散。从驱动机制看，意识形态共鸣、地缘战略利益诉求是其互动的主要推动力。干预与渗透的公开化、技术民粹动员和“私人化”非正式网络是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主要特征。这种互动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其效应主要体现在推动欧洲政治极化、美欧关系重塑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解构三个层面。

关 键 词：跨大西洋右翼； 民粹主义； 科技右翼； 特朗普

作者简介：外交学院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讲师 北京 100091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5)03—0056—22

一、引言

近年来,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势力的协同演进已突破传统的边界,形成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跨国联动网络。尤其是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右翼民粹力量不仅在反移民、反全球化和反多边主义等议题上与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等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频繁互动,更通过公开站台、政治背书等手段,系统性介入欧洲国家的政治进程。这种具有鲜明干涉主义特征的互动模式,标志着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已进入跨国协同运作的新阶段。

自2025年1月就职以来,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政坛的介入呈现官方与民间并存的双轨干预模式。在官方层面,特朗普政府采取选择性接触的策略与欧洲极右翼领导人密切互动。例如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中特意邀请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法国光复党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等极右翼领导人,而非英法德的建制派领导人。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 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拒绝与德国时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会面,反而秘密会晤德国选择党领导层。^① 在民间层面,特朗普团队借助智库论坛、社交媒体等平台对欧洲进行渗透和干预。被称为特朗普政府“大脑”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与欧洲右翼智库的互动中大肆抨击欧盟机构,甚至提出了“肢解欧盟”的计划。^② 曾任特朗普“政府效率部”主管的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则通过其控制的X平台积极渗透欧洲选举活动,在德国大选前的敏感时刻公开站台德国选择党,引发欧洲建制派的强烈反弹。^③

随着美欧右翼民粹力量互动频度和深度的升级,双方突破了传统地缘边界,逐渐形成了意识形态协同、资源互通与策略共振的跨大西洋协作网络。本文以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欧洲内政的干预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新阶段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驱动机制、核心特征及其影响。首先,以特朗普团队与德国选择党等欧洲

① Geir Moulson/Aamer Madhani, “US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meets German far-right leader as he criticizes ‘firewalls’ in Europe”, *The Associated Press*, 2025-02-15, <https://apnews.com/article/germany-munich-vance-free-speech-election-33e720b820e61db9d5e478e63b4a4dc7>, 访问日期:2025-02-18。

② Steve Rabey, “With 42% of Project 2025 enacted, Heritage Foundation turns toward Europe”, *Baptist News*, 2025-03-27, <https://baptistnews.com/article/with-42-of-project-2025-enacted-heritage-foundation-turns-toward-europe/>, 访问日期:2025-04-24。

③ 本文将马斯克作为跨大西洋右翼互动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之一。尽管马斯克在离开政府效率部后与特朗普公开产生争执,但双方在反非法移民、放松监管、反“觉醒主义”等核心议题上仍保持一致。马斯克仍积极利用其掌控的社交平台参与跨大西洋右翼议题的讨论。基于其在关键政策领域的立场、持续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右翼互动网络的实质性参与,本研究仍将其视为跨大西洋右翼互动网络的关键参与者,并将其纳入分析框架。

极右翼政党的互动为例,从多维度揭示新阶段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合作的驱动机制。其次,分析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特质,探究其互动模式和内在规律。最后,全面评估美欧右翼民粹力量互动对欧洲内部政治格局、跨大西洋关系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影响。

二、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在全球秩序深度调整与西方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频度和深度不断拓展。2016年,特朗普以反建制姿态赢得总统大选,极大地鼓舞了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美欧右翼民粹势力互动的频度随之不断上升。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跨大西洋右翼力量的互动进一步深化。马斯克在德国大选前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利用自身影响力为欧洲极右翼政党造势;^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抛出所谓欧洲“民主倒退论”,公开批评欧洲建制派对极右翼力量的排斥。^②相较于早期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等美国极右翼人士暗中联络欧洲在野右翼民粹政党的做法,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右翼力量对欧洲内政的干预更为直接,美欧右翼民粹势力的互动也更具公开性。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公开互动并非偶然,而是意识形态共鸣、地缘战略利益协同等深层次因素驱动的结果。

(一) 意识形态共鸣驱动

意识形态共鸣在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欧右翼民粹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度共振,一方面源于双方在核心价值理念上的深度契合,另一方面源于双方在各自崛起进程中使用的高度相似的民粹主义动员策略,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高度相似的政策框架,共同推动双方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上频繁互动。

其一,从核心价值理念看,美欧右翼民粹力量共享着以保守主义为内核的意识形态架构。双方均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强调通过民族认同的重构来重塑并强化国家主权,在反全球化浪潮、抵制多元文化主义及反移民等核心议题上形成战略同盟。无论是特朗普主导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还是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欧洲极右翼政党,都将语言、宗教、历史记忆等文化要素转化为民族身份区隔的刚性边界,把推进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复兴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支柱。美国的MAGA运动通过夸大非法移民对本土秩序的冲击、渲染外来移民抢占工作

^① Emily Atkinson, “JD Vance attacks Europe over free speech and migration”, *BBC*, 2025-02-1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eve3wl21x1o>, 访问日期:2025-04-23。

^② Ronald Beiner, “The plague of bannonism”, *Critical Review*, Vol. 31, No. 3-4, 2019, pp. 300-314, here pp. 305-308.

机会和社会福利、煽动对外来移民的仇恨来强化内部凝聚力。^①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如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则善于制造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叙事框架,将移民与多元文化议题提升至本土文明存续的高度。双方都善于通过激发本土族群对“文化身份消亡”的集体焦虑,为限制移民、排斥多元化的政策提供合法性。^②

其二,在核心价值理念深度契合的基础上,美欧右翼民粹力量围绕共同的政治逻辑与话语框架,衍生出高度趋同的民粹动员策略,即通过建构“人民主权—精英统治”的二元对立框架,解构传统自由民主话语体系。^③ 特朗普主导的 MAGA 运动热衷于制造“深层国家”的阴谋论,将官僚体系、国际组织与建制派媒体描述为“全球主义精英”,同时把自身塑造为“被遗忘的多数”的政治代言人,以此争夺政治话语权。而德国选择党等欧洲极右翼政党则善于选择具有高度分裂性的社会议题,如非法移民、穆斯林等作为切入点进行炒作,把经济、移民等社会问题归咎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将自身塑造为国家主权和本土利益的捍卫者,以争取疑欧主义者的支持。^④ 两者均善于将代议制民主运作中固有的程序性问题转化为具有道德色彩的“建制精英背叛人民”的政治伦理命题,在既有制度框架内不断消解公众对现有体制的信任。

其三,特朗普主导的 MAGA 运动和德国选择党等欧洲极右翼政党均将“民族国家”视作抵御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屏障,试图通过构建封闭性的民族叙事为内部社会经济矛盾寻求出路。^⑤ 两者均鼓吹“重建主权边界”的行动纲领,强调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让渡性”,将资本流动导致的产业空心化、移民涌入带来的社会结构变

^① Haley Ott, “Elon Musk tells German far-right crowd the nation should move beyond ‘past guilt’ ahead of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 CBS, 2025-01-28, <https://www.cbsnews.com/news/elon-musk-germany-far-right-afd-remarks-auschwitz-holocaust-remembrance-day/>, 访问日期:2025-02-15。

^② Henry A. Giroux, “White nationalism, armed culture and state violence in the age of Donald Trump”,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43, No. 9, 2017, pp. 887-910, here pp. 899-905; Jonas Fedders, „Die Wahlerfolge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im Kontext rassistischer Hegemoniebestrebungen“, in Alexander Häusler (Hrsg.),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6, S. 162-178, hier S. 167.

^③ Christiane Lemke, “Right-wing populism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 case study of the AfD”,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8, No. 2, 2020, pp. 90-108, here pp. 104-107.

^④ Jan P. Vogler, “Why do so many people hate EU bureaucracy?”, *Pub Affairs Bruxelles*, 2023-09-05, <https://www.pubaffairsbruxelles.eu/opinion-analysis/why-do-so-many-people-hate-eu-bureaucracy/>, 访问日期:2025-04-27。

^⑤ Dennis Eversberg, „Innerimperiale Kämpfe: Drei Thesen zum Verhältnis zwischen autoritärem Nationalismus und imperialer Lebensweise“, *PROKLA.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Nr. 190, 2018, S. 43-54, hier S. 45-49; Jarrel De Matas, “Making the Nation Great Again: Trumpism, Euro-Scepticism and the Surge of Populist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0, No. 2, 2017, pp. 19-36, here pp. 21-25.

迁以及多元文化碰撞引发的价值冲突全部归咎于主权边界的模糊。这种相似的归因模式也导致美欧右翼民粹力量在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主张上有极大的共识。在多边治理议题上,美欧右翼民粹力量都反对任何形式的超国家权威,将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主张将决策权力收归民族国家。在经济领域,美欧右翼民粹力量都主张通过强化国家对资本流动的跨境管制、推行保护性关税政策来重建经济主权。在社会政策层面,美欧右翼民粹力量都将人员跨国流动视为对民族国家凝聚力的根本性威胁,主张采取更为强硬的举措来抵制文化多元主义的渗透。

美欧右翼民粹力量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深度共振,是驱动其跨国互动与合作的重要引擎。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制派叙事”(如全球化红利分配、多元文化主义、多边主义规则)持续遭遇信任危机,为右翼民粹力量的批判性话语提供了生长空间。在当代美欧右翼的互动中,意识形态共鸣不仅是连接跨大西洋右翼的思想纽带,更成为其争夺政治话语权、重构权力关系的重要工具。这种共鸣植根于双方共享的保守主义内核,并依托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叙事进行政治动员,在反全球化、反多元主义等议题上进行相互声援和策应,形成跨大西洋的意识形态同盟与行动协同网络。

(二) 地缘战略利益的协同诉求

除了意识形态共鸣,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下共同的战略利益诉求也是推动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力。自2016年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广泛冲击,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以及欧洲右翼民粹力量在选举中获得新突破标志着这一秩序面临更大的挑战。^① 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批评欧洲建制派忽视民意、压制异见,并公开挑战所谓“防火墙”政策,即德国主流政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政治共识,可以被视为对欧洲传统建制派的一种压力测试。^② 这折射出美国右翼通过扶持欧洲极右翼力量进入主流政治舞台以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战略意图。而欧洲极右翼政党通过与特朗普政府的互动,在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同时提高了国际曝光度。双方战略互动背后的驱动因素可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从美国右翼“分而治之”的策略看,加强与欧洲右翼的互动,尤其是扶持在野的欧洲极右翼力量,有助于削弱欧洲内部行动的一致性,使得美国在对欧博弈中获

^① Cas Mudde, “The far right and the 2024 European elections”, *Intereconomics*, Vol. 59, No. 2, 2024, pp. 61–65, here pp. 63–64.

^② “Vance meets leader of Germany’s far-right AfD, attacks European ‘firewalls’ against populism”, *France24*, 2025–02–14,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50214-vance-meets-leader-of-germany-s-far-right-afd-as-he-slams-firewalls-in-europe>, 访问日期:2025–04–27。

得更多筹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欧战略出现重大转向,他不仅公开宣称“欧盟的成立就是为了搞垮美国”,还通过扶持欧洲内部的反建制势力,蓄意制造政治裂痕,系统性削弱欧盟的集体行动能力,为美国在双边博弈中创造结构性优势。^① 万斯秘密会见德国选择党领导层而冷落德国建制派领袖的外交姿态,特朗普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克林·杰奥尔杰斯库(Călin Georgescu)等被剥夺选举资格的欧洲极右翼领导人进行公开站台,以及其与梅洛尼、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等右翼领导人的密切互动,都是这一战略的具象化表现。^② 通过加强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互动,提升其国际曝光度,特朗普政府尝试打破欧洲主流政治的“防火墙”机制,推动欧洲极右翼力量深度渗透主流政坛,以此干扰欧盟统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进而在美欧贸易谈判、数字税以及跨大西洋安全责任重新分配等关键议题上,为自身谋取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与战略优势。^③ 因此,美国对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渗透,也是一种地缘战略布局。其通过对欧洲内政的干预和渗透,将欧洲右翼的政治议程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绑定,有助于美国在对欧博弈中获得更多筹码。

其二,从欧洲右翼民粹力量的“借势崛起”需求出发,德国选择党等欧洲极右翼势力面临提升国内合法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挑战,与特朗普等美国右翼民粹力量的公开联动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策略。近年来,欧洲部分极右翼政党尽管得票率持续上升,但在国内政治生态中始终被主流建制派力量所排斥。以反移民、反全球化为核心的民粹主义叙事,虽能利用经济衰退、文化冲突等社会矛盾获取部分选民支持,却难以摆脱“极端”的标签。主流政党基于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伦理的约束,普遍拒绝与其组成执政联盟,导致极右翼即便获得较高选票也难以获得执政地位。这种困境迫使它们转向跨国场域,通过国际右翼网络增强自身国际合法性,并利用外部权威的背书突破内部执政的“天花板”。德国选择党党首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多次引用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创造出所谓“让德国再次伟大”。^④ 这种口号的借用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而是试图借助特朗普在美国及全球

① “Trump says the EU was formed to ‘screw’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24*, 2025 - 02 - 26,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50226-trump-says-eu-formed-to-screw-united-states-tariffs>, 访问日期:2025 - 03 - 21。

② “Vance meets German far-right AfD leader amid election interference criticism”, *Reuters*, 2025 - 02 - 1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berlin-says-vance-should-not-interfere-german-politics-2025-02-14/>, 访问日期:2025 - 02 - 20。

③ 马骏驰:《欧尔班背书特朗普,匈美右翼保守力量政治联姻》,载《世界知识》,2024年第8期,第46 - 47页。

④ “Far-right AfD party appears to be heading for its strongest result in Germany’s election”, *PBS*, 2025 - 02 - 13, <https://www.pbs.org/newshour/world/far-right-afd-party-appears-to-be-heading-for-its-strongest-result-in-germanys-election>, 访问日期:2025 - 04 - 11。

范围内的影响力,在德国国内吸引更多对现状不满的选民群体。^①因此,极右翼力量的国际联动不仅是一种理念共振,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再生产机制。欧洲极右翼力量一方面通过移植美国右翼的“反精英”“反觉醒主义”的叙事模板,将本土议题纳入全球右翼的价值坐标系,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与国际右翼政要开展象征性互动,在反移民、反全球化等议题上相互协同,助力自身突破内部执政的“天花板”。

其三,在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中,欧洲极右翼政党对科技平台话语权的追逐,也是推动其与美国右翼尤其是科技右翼互动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包括德国选择党在内的欧洲极右翼力量长期以来认为主流媒体的审查机制限制了言论自由,将新兴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宣传其主张的主要阵地,因此极力反对欧盟以监管行动施压社交媒体平台对用户言论进行审查。^②另一方面,X等美国科技右翼控制的社交平台为吸引更多用户,长期以来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放宽内容审核机制,削弱对仇恨言论与虚假信息的限制,为欧洲极右翼政党传播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等主张创造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并因此多次受到欧盟调查。^③因此,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右翼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数字产业的“去监管”层面的政策立场具有高度一致性。^④这种政商协同背后折射出科技资本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新型战略协同。德国选择党等欧洲极右翼势力通过积极依附社交媒体平台与跨国资本力量,突破传统媒体对极端言论的过滤机制,在强化本土政治动员能力的同时提升其国际舆论场的曝光度。美国科技右翼则借助右翼民粹政党的力量弱化欧盟统一数字监管,实现自身拓展市场的诉求。^⑤双方在削弱欧盟经济治理权威的共同目标下相互策应协同。

基于意识形态的共振和战略利益的协同诉求,美欧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频度

① “‘Make Germany great again’: Far-right party could see historic gains in this election. Here’s why”, *The Economics Times*, 2024-02-23,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global-trends/make-germany-great-again-far-right-party-could-see-historic-gains-in-this-election-heres-why/articleshow/118506479.cms?from=mdr>, 访问日期:2025-01-11。

② Darren Loucaides, “How the EU’s Far Right Will Boost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WIRED*, 2019-05-24, <https://www.wired.com/story/will-a-victory-for-europes-far-right-be-good-for-big-tech/>, 访问日期:2025-03-11。

③ Nikola Doderović, “Agora on the Internet: Can X’s Spaces be interpreted as a Digital Platform for Democracy?”, *Media Studies and Applied Ethics*, Vol. 5, No. 2, 2024, pp. 47-61, here pp. 57-61.

④ Jan Menzner/Richard Traunmüller, “Subjective freedom of speech: Why do citizens think they cannot speak freely?”,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Vol. 64, No. 1, 2023, pp. 155-181, here pp. 163-167.

⑤ Adam Satariano/Jeanne Smialek, “E. U. Expands Investigation of X Over Spread of Illicit Content”, *New York Times*, 2025-01-17,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7/business/eu-investigation-x-musk.html>, 访问日期:2025-02-15。

广度不断上升。美国右翼通过扶持欧洲极右翼扩大全球影响力，欧洲极右翼借助外部支持突破国内政治“天花板”，而科技寡头则从中寻求政策红利。这种互动对欧洲政治生态与跨大西洋关系结构产生双重冲击，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分化，削弱了成员国在外交政策与数字监管上的共识，同时也冲击了现有的跨大西洋交往体系。

三、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特征

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联动的深化，不仅体现为美欧双方互动频度的提高，更体现在右翼联盟互动具体机制的转型与升级上。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班农等极右翼分子推动美欧右翼互动，当前的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具有一系列新的特质。不仅美欧右翼互动的场域更具公开性，而且在互动进程中，技术资本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结合更加紧密，同时互动主体也更为多元化。

（一）干预与渗透公开化

相较于过往美欧右翼的互动，当前的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更具公开性，尤其是美国右翼力量对欧洲内政的干预和渗透更具侵略性，这给欧洲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和跨大西洋关系格局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右翼力量通过幕后策划、秘密会议等方式介入欧洲内政，例如班农等美国极右翼分子曾穿梭于欧洲各国，与欧洲极右翼政党进行互动，在幕后制定政治策略并协调行动步骤，以间接手段影响欧洲政治进程。^①然而，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欧右翼力量不再满足于暗地协调，双方的互动进一步公开化。尤其是美国右翼领导人在双边以及多边场合更为高调地介入欧洲内政，不仅直接干涉欧洲国家的选举活动，批评欧洲的司法体系，还对欧洲民主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攻击，由此引发了欧洲主流建制派的强烈反弹。具体来看，这种介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美国右翼力量直接介入欧洲国家选举进程，通过公开站台、舆论造势等手段扶植意识形态相近的政治力量，试图左右选举结果。在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期间，隶属于特朗普阵营的马斯克不仅现身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竞选集会，以视频形式表达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还在德国媒体上公开撰文称其为德国“最后的希望”，并公开要求德国时任总理朔尔茨尽早下台。^②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则撇开时任总理朔尔茨，转而与德国选择党领导层进行会晤，还

^① “Steve Bannon’s (Lonely) European Vacation”, *SPL center*, 2019-02-20, <https://www.splcenter.org/resources/reports/steve-bannons-lonely-european-vacation/>, 访问日期:2025-05-29。

^② Jones Hayden, “Musk calls AfD ‘last spark of hope’ for Germany in op-ed in Welt”, *POLITICO*, 2024-12-2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musk-calls-far-right-afd-last-spark-hope-for-germany-op-ed-rightwing-scholz-merz-welt-am-sonntag/>, 访问日期:2025-06-03。

在演讲中公开批评德国建制派对德国选择党的排斥。^① 在2025年波兰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政府也公开介入其选举进程,一方面右翼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飞往华盛顿获得特朗普接见,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主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还特意于5月下旬在波兰召开首次会议,为纳夫罗茨基的选举造势助威。^② 而到访波兰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在演讲中不仅大肆攻击自由派候选人拉法尔·特拉斯科夫斯基(Rafał Trzaskowski),还称纳夫罗茨基是和特朗普一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直言后者“应该成为波兰下一任总统”,公开对其进行政治背书。^③ 特朗普政府核心成员对欧洲国家选举活动的粗暴干预,直接冲击了美欧政治交往的潜在规则。

其二,美国右翼力量还借助一系列极右翼候选人被取消竞选资格的案件,对欧洲国家司法体系进行公开抨击。例如,在2024年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与特朗普政策立场高度相似的极右翼候选人杰奥尔杰斯库意外在初选中赢得了最多的选票,民调也显示其在最终的决选中领先于对手。^④ 但是随后罗马尼亚选举委员会指控选举遭到了俄罗斯的干预,最终罗马尼亚宪法法院裁定选举结果无效,下令重新举行选举。紧接着,罗马尼亚官方不仅一度以反犹主义、破坏宪法秩序等名义逮捕杰奥尔杰斯库,还于2025年3月直接取消其竞选资格。^⑤ 美国副总统万斯严厉批评罗马尼亚法院的判决,称这一判决屈从于“站不住脚的情报和欧洲压力”,马斯克以及特朗普科技顾问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则在社交媒体上多次抨击罗马尼亚法院的决定过于“疯狂”,是新的司法专制。^⑥ 2025年3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因挪用欧盟资金被定罪,并禁任公职五年,引发巨大争议。特朗普

① Andrew Roth, “JD Vance breaks taboo by meeting with leader of Germany’s far-right party”, *Guardian*, 2025-02-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feb/14/jd-vance-alice-weidel-meeting-germany-far-right>, 访问日期:2025-06-07。

② “CPAC brings MAGA message to Poland ahead of presidential vote”, *Bne IntelliNews*, 2025-05-28, <https://www.intellinews.com/cpac-brings-maga-message-to-poland-ahead-of-presidential-vote-383295/>, 访问日期:2025-06-08。

③ “Noem urges Poles to elect Trump ally as CPAC holds its first meeting in Poland”, *NPR*, 2025-05-28, <https://www.npr.org/2025/05/28/g-s1-69278/noem-cpac-poland>, 访问日期:2025-06-07。

④ Jon Henley, “Shock as pro-Russia independent wins first round of Romanian election”, *Guardian*, 2024-11-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nov/25/calin-georgescu-romania-election-hard-right-candidate>, 访问日期:2025-06-08。

⑤ “Far-right candidate Calin Georgescu barred from Romania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run”, *Reuters*, 2025-03-1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omanian-far-right-candidate-barred-may-presidential-vote-2025-03-09/>, 访问日期:2025-06-08。

⑥ David Ingram, “Trump’s tech advisers question Romanian election, diverging from U.S. diplomat’s message”, *NBC*, 2025-05-21, <https://www.nbcnews.com/tech/internet/trumps-tech-advisers-question-romanian-election-odds-us-diplomat-rcna207803>, 访问日期:2025-06-09。

在社交媒体上将此案比拟为自己曾面临的“法律迫害”，对其进行公开声援。马斯克更公开把这一判决称作“欧洲左翼利用法律战压制言论自由的又一例证”，宣称“欧洲司法体系正在摧毁民主”。^①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对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将德国选择党定义为“极端组织”的做法进行抨击，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均表示此类行动是“伪装的暴政”，等同于政治迫害。^②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外交施压，为被欧洲司法系统制裁的极右翼候选人“平反”，直接干预欧洲司法主权。

其三，美国右翼力量还对欧洲的民主治理体系以及欧盟的治理机构进行系统性攻击。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大肆攻击欧洲的民主体系、移民政策和言论管制，并在演讲中声称“欧洲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中俄，而是来自内部”，认为欧洲主流建制派压制言论自由以及对极右翼政党的排斥已经背离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③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与欧洲右翼智库的会议中，指出“欧盟官僚体系正在摧毁民主”，宣称需要对欧盟主要机构进行改革。传统基金会提出要彻底解散欧盟委员会，收回欧盟的行政权限；同时对欧洲法院进行彻底改革，废除其最高司法权，让各成员国重新获得司法主权；还要求削弱欧洲议会权限，将其权力重新限缩至咨询权；从而彻底将欧盟重组为松散“欧洲国家共同体”，恢复民族国家“主权”。^④ 这些激进的提议和批评以恢复“民主”“言论自由”和“主权”为名，实则是尝试从根本上瓦解欧盟赖以运作的超国家治理框架和共同规则体系。

美国右翼力量对欧洲内政的干预不仅体现在对欧盟选举、司法和民主运行的干预上，还蔓延至一系列社会文化议题。随着美欧右翼在气候政策、性别平等、觉醒主义等议题上互动日趋频繁，其对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女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也变得更加公开化。^⑤ 这推动了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

① Gabriel Stargardter/Kanishka Singh, “‘Free Le Pen!’ Trump, Musk and Vance voice support for French far-right leader”, *Reuters*, 2025-04-0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trump-offers-support-french-far-right-leader-le-pen-after-her-conviction-2025-04-04/>, 访问日期:2025-06-09。

② “US Secretary of State Rubio says Germany is a ‘tyranny in disguise’ after AfD verdict”, *Euronews*, 2025-03-05,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3/05/us-secretary-of-state-rubio-says-germany-is-a-tyranny-in-disguise-after-afd-verdict>, 访问日期:2025-06-09。

③ Nandita Bose/Doina Chiacu, “In Munich, Vance accuses European politicians of censoring free speech”, *Reuters*, 2025-02-1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vance-uses-munich-speech-criticize-europe-censoring-free-speech-2025-02-14/>, 访问日期:2025-06-07。

④ Sam Brighton,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Allies Discuss Dismantling the EU”, *Desmog*, 2025-03-14, <https://www.desmog.com/2025/03/14/heritage-foundation-project-2025-allies-mcc-ordo-iuris-discuss-dismantling-the-eu-european-union/>, 访问日期:2025-04-24。

⑤ Greta Hughson, “Who’s financing the ‘anti-gender’ movement in Europe?”, *aidsmap*, 2021-05-27, <https://www.aidsmap.com/news/may-2021/whos-financing-anti-gender-movement-europe>, 访问日期:2025-04-27。

的深度、广度和频度不断提升。

(二) 技术民粹动员

在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传播生态中, X、Gettr 等新兴社交平台的迅速发展, 使得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力量的互动呈现更为复杂的媒介技术特征。这些平台具有去中介化传播机制、算法赋权以及即时性反馈的特点, 使右翼力量得以利用新兴技术, 构建起新形态跨国民粹动员网络。

首先, 新兴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去中介化传播机制重塑了右翼政治议程的传播路径。以 X 平台为例, 该平台在被马斯克收购之后不断放宽言论审核, 解禁大量极右翼账号, 成为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势力进行互动的重要枢纽。例如, 在 2025 年德国大选期间, 美国右翼力量积极利用该平台介入德国大选, 马斯克更利用其坐拥 2.1 亿粉丝的超级账号, 密集发布数十条支持德国选择党及其领导层的推文。德国选择党领袖魏德尔 2025 年 1 月预告与马斯克直播对话的推文创下 2400 万次阅读纪录。相比之下, 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同期宣传移民政策的最高热度贴文仅获 220 万次阅读。^① 受益于与马斯克的持续互动, 魏德尔个人 X 账号粉丝量在八个月内翻倍, 成功跨越百万量级门槛, 并带动德国选择党的社交媒体影响力大幅攀升。社交媒体提供的新的传播渠道有效突破了传统媒介机构对信息的过滤, 使得极右翼政党得以直接与更多潜在支持者建立情感共鸣。

其次, 算法加持下的技术赋权提升了右翼民粹力量对选举议程的操控能力。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右翼不仅掌握着信息分发的技术基础设施, 更通过操控算法推荐机制将极右翼议程定向推送至目标受众。^② 在 2024 年美国大选期间, X 平台因在流量倾斜上偏向特朗普而备受争议。2025 年德国大选期间, 马斯克账号的流量加持以及 X 平台的算法推荐同样显著放大了极右翼叙事的传播效应。^③ 全球

① Chris Lunday, "Merz's far-right gamble backfires", *POLITICO*, 2025-01-3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riedrich-merz-germany-gamble-to-accept-far-right-support-fails-in-parliament-afd-cdu-migration/>, 访问日期: 2025-02-15。

② Jasmin Dall'Agnola, "Illiberal Technologies: Linking Tech Companies,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n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Illiberalism Studies*, Vol. 4, No. 3, 2024, pp. 1-10, here pp. 7-9.

③ Von Pascal Siggelkow, "Wie Musk sich in den Wahlkampf einmischt", *Tagesschau*, 2024-01-24, <https://www.tagesschau.de/faktenfinder/kontext/musk-x-bundestagswahl-100.html>, 访问日期: 2025-05-01; "Habeck fordert Musk zur Offenlegung von Algorithmus auf", *ZEIT Online*, 2025-01-09, <https://www.zeit.de/news/2025-01/09/habeck-fordert-musk-zur-offenlegung-von-algorithmus-auf>, 访问日期: 2025-05-01; Maria Fiedler, "Einen wertvolleren Wahlkampfhelfer hätte die AfD sich nicht vorstellen können", *Der Spiegel*, 2024-12-31,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elon-musk-politikberater-nennt-ihn-wertvollsten-wahlkampfhelfer-fuer-die-afd-a-a32a7541-95ac-4927-9521-08ad32dfc763>, 访问日期: 2025-05-04; Klaus Behnam Shad, "Algorithmic Hegemony: AI,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Electoral Influence", *Journal of Sociocybernetics*, Vol. 20, No. 1, 2025, pp. 13-41, here pp. 17-22.

见证组织(Global Witness)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选举前 X 平台向无党派德国本土用户推荐的选举内容中,德国选择党占 64%,而其他主要政党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的推荐内容加在一起也仅有 36%,德国选择党在 X 平台上的曝光率显著高于其他政党。^① 在 X 平台的流量倾斜下,德国选择党将自身对相关议题的叙事渗入德国公共议题的辩论中,依靠巨大的曝光度和话题性影响选举议程。

再次,极右翼通过制造争议性言论形成“数字平台造浪—传统媒体追浪”的共振效应,实现了高流量—媒体曝光—政治资本的高效转化。这种策略是将特朗普早期崛起的“洪水式宣传”(Flood the Zone)策略战术数字化升级,^②即通过蓄意挑衅引起媒体的关注,进而在公众有限的注意力范围内提高自己的曝光度,挤压其他政党的发声空间。在 2016 年选举中,特朗普的针对性挑衅成功地吸引了公众注意力。在社交媒体渗透率更高的今天,这种传播策略能够有效利用数字注意力经济的结构性漏洞,推动极端言论的互动量和关注度大幅提升。在 2025 年德国大选中,美欧右翼也不断通过挑战德国战后政治话语的禁忌边界提高自身的曝光度。例如,马斯克与魏德尔在对话中充分利用“争议即流量”的传播效应,多次刻意发表诸如德国人“不应为祖辈罪行负责”的言论,两者的互动迅速被主流媒体大量报道,而传统媒体为追逐流量被迫将德国选择党报道锁定在右翼设定的议程中,有效提高了其选前曝光率。^③ 此举不仅有效提升了其在线上的关注度,还使得极右翼领导人在选举期间大量占据传统媒介的版面。

最后,新兴社交媒体驱动下的即时政治加速了民粹主义话语的病毒式扩散。传统上,极右翼议程的传播依赖右翼媒体的集中报道,通过单向灌输和周期性舆论攻势塑造共识,其动员效率受限于传统媒体的生产周期。相比之下,新兴右翼社交平台下兴起的即时互动模式则突破了传播媒介的传播局限,使得右翼力量能够精准捕捉社会焦虑点,从而构建起与支持者高频互动的场域。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对本土社群进行深度渗透,将移民、多元文化等宏观政治危机议题与犯罪、社区安

① “X and TikTok algorithms push pro-AfD content to non-partisan German users — new analysis”, *Global Witness*, 2025-02-20, <https://globalwitness.org/en/press-releases/x-and-tiktok-algorithms-push-pro-afd-content-to-non-partisan-german-users-new-analysis/>, 访问日期:2025-02-27。

② Chris Wells et al., “How Trump drove coverage to the nomination: Hybrid media campaign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33, No. 4, 2016, pp. 669-676, here pp. 671-673.

③ Giselle Ruhiyyih Ewing, “Musk tells Germans to get over ‘past guilt’ in speech to far-right AfD rally”, *POLITICO*, 2025-01-26,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1/25/musk-german-afd-rally-weidel-00200620>, 访问日期:2025-04-24; Jan Rau, “‘Flood the Zone with Shit’— Elon Musk, the AfD and the Agenda-Setting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2025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The Leibniz Institute for Media Research*, 2025-02-23, <https://leibniz-hbi.de/en/elon-musk-the-afd-and-the-agenda-setting-of-the-radical-right-in-the-2025-german-federal-election/>, 访问日期:2025-04-24。

全等具体的本地冲突议题相连接,从而有效刺激支持者自发扩散极端言论。在2025年德国大选期间,德国选择党就利用马格德堡圣诞集市的移民撞人事件,在社交平台大力炒作外来移民的犯罪问题。这种即时性的话题炒作策略,既强化了极右翼支持者忠诚度,也迫使反对者卷入辩论,使德国选择党得以对选举议程施加更大的影响力。^①

技术民粹动员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传播范式。社交媒体、算法驱动以及“即时政治”提升了极右翼意识形态的传播效率,同时也重构了政治权力与技术资本的互动关系。^② 技术寡头以言论自由之名,通过控制信息基础设施介入主权国家的选举政治,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新型霸权实践,对西方的民主体系产生巨大挑战。

(三)“私人化”的跨国右翼联动网络

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势力的互动还具有一种超越传统制度框架的“私人化”联动特征。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依托非国家行为体(如私人资本、意见领袖及右翼民粹领袖等多元主体),绕过传统政党外交或政府间机制,构建灵活的非正式的跨国协同网络。

传统意义上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主要局限于政党、游说组织等政治团体之间。例如,2018年,班农凭借在布鲁塞尔协助建立“运动”组织与欧洲多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及政治人物建立联系。他设想在欧洲议会内组建极右翼“超级团体”,推动极右翼政治团体之间协作。^③ 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美欧右翼互动的主体呈现显著的多元化的特征,其互动网络突破传统政党交往的边界,向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群体拓展。美国的科技右翼以及传统的能源资本深度渗入跨大西洋互动网络,扶持草根运动及激进势力,借助加密通讯、替代性社交平台 and 线下抗议活动进行频繁互动。美国福音派与欧洲保守基督教团体围绕反 LGBTQ+、反女权等议题进行协作。右翼自媒体意见领袖和网红依托 Newsmax、OANN 等新兴的美欧右翼媒体传播右翼的思想和观点。具有右翼倾向的美欧智库也借助一系列论坛加强协同。

① Rachel Treisman, “Elon Musk faces criticism for encouraging Germans to move beyond ‘past guilt’”, *NPR*, 2025-01-27, <https://www.npr.org/2025/01/27/nx-s1-5276084/elon-musk-german-far-right-afd-holocaust>, 访问日期:2025-02-23。

② 陈文胜:《社交媒体时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传播》,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第20-38页,这里第33-37页。

③ Tatiana Zonova, “The spread of sovereignty in EU: the Italian case as populist laboratory”, *Journal of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Vol. 2, 2019, pp. 18-28, here pp. 22-26.

表 1 跨大西洋右翼民粹互动模式差异

时期	2016—2022 年	2022 年至今
主体	政治策略家、民粹政党	科技寡头、右翼网红等
传播工具	传统媒体、线下运动	社交媒体、算法推荐、线上直播
意识形态焦点	反全球化、反精英	反多元文化、反官僚主义
干预形式	幕后协调、策略培训	公开站台、资本渗透、平台操控
主流社会反应	限于政治精英层的批评	大规模民间抗议、跨国监管升级

注：此表以 2022 年马斯克收购 X 平台作为分水岭，将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分为两个时期。马斯克在收购 X 平台后，解禁大批极右翼账号并放松内容管制，使 X 平台迅速转型为右翼叙事的核心传播枢纽，美欧右翼力量的互动网络在此节点呈现一系列新的特质。

来源：作者自制。

美欧右翼互动已从早期以政党精英和议会团体为核心的协作架构，演变为涵盖科技资本、新兴媒体、宗教团体与智库的多维互动网络。其中属于特朗普个人所有的海湖庄园更成为欧洲极右翼政党领袖、意见领袖聚集的重要基地，欧洲极右翼分子在此与特朗普团队构筑互动网络，形成右翼的“私人俱乐部”。在俱乐部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往往通过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机制直接协调政治议程，形成了游离于传统交往体系之外的“私人化”的互动网络。

从结构特征看，跨大西洋右翼民粹联盟的“私人化”互动网络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上。其一，以彼得·泰尔(Peter Thiel)、马斯克等科技寡头为代表的资本网络，通过密集投资将数字平台转化为跨国政治动员工具。例如，马斯克收购 X 平台后系统性调整内容审核规则，为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极右政党提供了宣传政策主张的重要渠道，马斯克的个人账号更成为放大反移民、反气候政策叙事的“超级节点”。其二，以特朗普为核心的“后总统权力网络”通过海湖庄园等私人会员制俱乐部以及共和党主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与欧洲极右翼分子建立直连通道。不仅梅洛尼等欧洲已经执政的极右翼领导人多次进入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特朗普还在此接见大量在野的欧洲极右翼分子。例如，2025 年，德国选择党众多青年活跃分子在选前积极探访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获得特朗普的接见。大量欧洲极右翼意见领袖和网红也在此与特朗普团队互动。美国共和党主导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也频繁邀请欧洲极右翼领导人和意见领袖参加，双方互动深度和频度不断增加。^① 其三，右翼知识分子、媒体人依托流媒体采访、智库论坛和博客构筑媒介知识网络。美国保守派媒体人如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等通过

^① Deborah Cole, “Far-right activists from Germany spent US election day at Trump’s Mar-a-Lago”, *Guardian*, 2024 - 12 - 0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4/dec/07/far-right-activists-from-germany-spent-us-election-day-at-trumps-mar-a-lago>, 访问日期：2025 - 01 - 31。

Youtube、Substack 专栏等渠道,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欧洲右翼领导人进行的公开连线对话,吸引大批观众。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派智库则通过与欧洲右翼智库的积极互动,提升右翼话语影响力。^①

右翼民粹力量“私人化”的互动网络挑战了传统政治实体主导的制度化交往体系,成为极右翼跨国协作的重要机制。在这一互动模式中,技术资本、个人化权力网络与极右翼意识形态相互嵌套,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共同理念和利益诉求的动员网络。这一模式给欧洲内部政治秩序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结构带来一系列冲击。

四、影响分析:政治极化、跨大西洋关系重构与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解构

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势力的深度互动,对西方内部政治生态、跨大西洋关系及国际秩序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左右当今国际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在欧洲内部,美欧右翼的互动加剧了欧洲内部政治极化,挑战着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在美欧关系层面,尽管传统大西洋联盟依然存在,但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及互动深刻改变了其内涵与运作方式。其非正式的、“私人化”的跨国网络有时会形成针对特定议题(如移民政策、文化战争)的“价值观同盟”,但这种同盟往往具有工具性和选择性,服务于特定的民族主义议程,而非稳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秩序层面,跨大西洋右翼民粹的协同共振,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危机,冲击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一) 欧洲政治极化加剧

美欧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显著加剧了欧洲社会的政治极化与身份认同危机。双方在反移民、反全球化、疑欧主义(在欧洲)以及反建制、反“政治正确”等核心议题上的相互声援与策略借鉴,不仅壮大了本土右翼民粹运动的声势,加剧了欧洲内部的意识形态分化,还催化了欧洲内部的政治暴力,给欧洲二战后自由民主共识带来一系列挑战。

其一,特朗普再次当选及其上任后对欧洲反建制力量的公开声援,鼓舞了欧洲的极右翼力量。其高举民族主义、反建制与反全球化大旗,不仅影响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定位,更加剧了欧洲社会内的意识形态撕裂。一方面,特朗普的成功示范效应,使得欧洲极右翼在诸如移民问题、国家主权让渡、文化认同等核心议题上的立场更为激进。极右翼力量不再满足于边缘化的抗议角色,而是更加积极地谋

^① Márton Losonczy, “Viktor Orbán to Tucker Carlson: ‘Call Back Trump, That’s the Only Way Out of the War’”, *Hungarian Conservative*, 2023-08-31, https://www.hungari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politics/viktororbán_tucker_carlson_interview_call_back_trump_end_war_twitter/, 访问日期:2025-02-03。

求进入执政联盟,并提出激进的替代性政策方案。另一方面,特朗普式话语体系中的对抗性、简单化口号以及对“深层势力”的阴谋论指控,被欧洲极右翼广泛吸纳并本土化,其不仅出现在欧洲极右翼政党竞选语言中,更渗透到其日常政治传播中。越来越多“特朗普式”极右翼领袖的出现,使得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话语鸿沟日趋加深,加剧了欧洲内部不同阵营间的政治对立。

其二,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催生了一系列欧洲政治极端暴力团体,加剧了欧洲的社会动荡。近年来,随着极右翼政党(如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的反移民、反欧盟议程与传统建制派的对立日趋尖锐,政党之间对话空间萎缩,政治攻讦加剧。政治精英日益将选举视为零和博弈竞争,来自不同阵营的政党不再将对方视为一般的政治对手,而将其视为敌人,并号召支持者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压制敌对阵营。例如,德国建制派力量越来越多地利用主流媒体乃至司法体系,将德国选择党贴上“新纳粹”的标签来动员反极右抗议,而德国选择党则在抗议中不断煽动暴力。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极右翼政治团体通过模仿特朗普式政治修辞和符号系统,将美国右翼组织如“骄傲男孩”的街头战术与欧洲本土排外主义嫁接,形成新型暴力动员模式,美式民粹主义的对抗性叙事被逐渐嵌入欧洲街头政治。^① 新兴的 X、Telegram 等社交平台不仅为极右翼提供了极端言论的“避风港”,还为其进行跨国组织动员实施暴力活动以及对敌对阵营进行政治恐吓提供便利的平台。^② 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相互模仿和联动,催生了一系列以“街头暴力重构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极端团体,它们依托社交平台的去中心化网络躲避监管、散播仇恨言论并进行组织动员,将欧洲社会推向暴力对抗常态化的危险境地。

其三,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也给欧洲民主体系的运行带来新的挑战,使得德国等国家二战之后建构的“防御型民主”备受冲击。二战后,欧洲为防范法西斯主义复苏建立了“防御型民主”机制,这一机制通过宪法法院审查、政党禁令等手段压制极端主义。^③ 为协助欧洲极右翼突破执政“天花板”,美国右翼力量一方

^① Jan van der Made, “Far-right rally in Berlin faces Antifa resistance on eve of crucial German elections”, *RFI*, 2025-02-22, <https://www.rfi.fr/en/international/20250222-far-right-rally-in-berlin-faces-antifa-resistance-on-eve-of-crucial-german-elections>, 访问日期:2025-04-09。

^② Heidi Schulze et al., “Far-right conspiracy groups on fringe platform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radicalization dynamics on Telegram”,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Vol. 28, No. 4, 2022, pp. 1103-1126, here pp. 1112-1120; Sal Hagen, “‘Who is/our-guy/?’: Tracing panoramic memes to study the collectivity of 4chan/pol”,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6, No. 4, 2024, pp. 1735-1755, here pp. 1736-1744.

^③ Ami Pedahzur, “The defending democracy and the extreme righ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Roger Eatwell/Cas Mudde (eds.),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the new extreme right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26-150, here pp. 131-135.

面对欧洲的民主和司法体系进行系统性攻击。例如,美国副总统万斯不仅在多个场合批评欧洲建制派对极右翼政党的打压和排斥,还指责欧洲法院体系已经成为建制派打压政敌的工具,宣称欧洲“民主价值观正在退化”。^①另一方面,美国右翼通过将西方建制派进步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体系塑造为“政治正确”暴政,为欧洲本土极右翼势力突破“民主禁忌”提供合法性掩护。例如,马斯克等人在介入德国选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德国人应为自身文化自豪”等,^②事实上是在协助德国选择党解构战后德国以反思纳粹历史为核心的政治正确体系。这一系列互动直接冲击了欧洲二战后形成的多元民主体系的价值观根基。

欧洲政治极化的加剧表明,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输出,而且是一种基于危机共振的协作。右翼力量通过放大本土矛盾、重构政治话语及突破历史禁忌,将欧洲政治极化嵌入全球民粹主义浪潮中,直接冲击了建制派主导的民主话语体系。右翼民粹力量的跨国互动不仅推动传统政党在具体政策议题上进一步转向,更逐步将民粹主义嵌入代议制内核,直接触及欧洲民主的根基,对欧洲共识性民主体制构成巨大挑战。

(二) 跨大西洋关系结构变迁

新时期美欧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造成一系列冲击。传统上,跨大西洋联盟通过北约安全架构和共享民主价值观建立常态化交往体系,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不仅依靠军事政治联盟的制度性协作机制,更有赖于双方对多元民主价值的深层认同。然而,近年来大西洋两岸掀起的右翼政治浪潮和互动冲击了既有制度性合作框架和价值共识,其通过意识形态重构、交往体系重组和联盟内部结构转向三个维度,推动传统跨大西洋互动模式发生一系列嬗变。

首先,在意识形态重构维度,美欧右翼民粹势力依托民族主义、反全球化与文化保守主义等核心支柱构筑起新的跨大西洋意识形态联盟。这一联盟直接冲击了传统上西方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价值共同体,转而构建起基于主权优先和民族国家的替代性价值框架。这种新的基于民族国家叙事的意识形态联盟,一方面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多边国际协作体系污名化为“全球主义精英”的工具,挑战其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在跨大西洋民主体系内部发动认知革命,通过匈牙

^① Jim Tankersley/Steven Erlanger/David E. Sanger, “Vance Tells Europeans to Stop Shunning Parties Deemed Extreme”, *New York Times*, 2025-02-19,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19/world/europe/vance-europe-immigration-ukraine.html>, 访问日期:2025-04-11。

^② Nette Nöstlinger/Emily Schultheis, “Musk’s ‘move on’ from the Holocaust plea challenges enduring German taboo”, *POLITICO*, 2025-01-2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lon-musk-holocaust-plea-challenge-historic-germany-taboo/>, 访问日期:2025-04-09。

利青民盟的“非自由民主”模式、特朗普主义的“深层政府”等右翼叙事,构建起与传统西方自由民主范式相对抗的话语框架。^① 这种跨国互动不仅在价值层面形成了对西方多元民主共识的解构力量,更在制度层面催生了瓦解既有民主体系的异质性力量。

其次,从交往体系重组视角看,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及其共振效应正推动欧洲极右翼政党与美国保守派精英构建起超越传统外交范式的非正式协作网络。该网络利用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和反精英情绪,通过议题捆绑与话语共振解构由传统建制派主导的交往体系。无论是美国保守派年度行动会议频繁邀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右翼领袖发表演讲,还是美欧右翼在海湖庄园构筑的“私人化”的右翼互动网络,都表明美欧右翼互动正在突破原有的交往框架,朝着交往主体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这些非正式的协作机制提升了右翼话语的影响力,也促使美欧右翼在质疑气候变化、收紧移民政策、解构多边机制等关键领域形成协同立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科技资本与本土右翼政治力量的快速合流,成为右翼势力渗透欧洲具体政策议题的有效抓手,催生出政商复合体主导的新型权力网络。^② 至此,美欧右翼的交往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政府间渠道,而是借助跨国资本、社交媒体和意识形态网络形成多节点渗透态势,为跨大西洋政治互动注入新的变量。

最后,从联盟内部结构看,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正在西方内部催生出两个对立性政治集团。在跨大西洋政治空间,欧洲建制派中左翼政党与美国民主党构建起“进步价值同盟”。这一阵营以多边主义、全球化深化、身份多元主义为核心理念,通过跨国政党网络、国际组织协调与规则制定机制形成价值共振,在移民、气候政策等议题上不断强化协作。而在意识形态光谱另一端,美国共和党右翼与欧洲民粹势力则形成“右翼联盟”。这些力量以民族主义重构身份,借助反建制话语挑战自由民主共识,通过共享叙事框架实现理念联动。其跨国协作也绕过传统制度化协作机制,依赖社交媒体传播、草根组织联动与智库网络,构建起扁平化的跨国动员体系。这两大阵营的对立日趋尖锐,使得二战后西方社会基于传统自由民主共识的联盟建构逻辑出现重大转向,跨大西洋关系结构的核心张力已演变为意识形态光谱内的进步与保守之争,其未来发展将取决于大西洋两岸传统建制派与

^① Saskia Pauline Ruth-Lovell/Sandra Grahn, “Threat or corrective to democra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ism and different models of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62, No. 3, 2023, pp. 677–698, here pp. 678–683.

^② Rob Picheta, “Elon Musk is causing trouble in Europe. What’s in it for him?”, *CNN*, 2025–01–23, <https://edition.cnn.com/2025/01/23/europe/elon-musk-europe-politics-x-disinformation-gbr-cmd-intl/index.html>, 访问日期:2025–01–28。

右翼民粹势力间的博弈。

在上述三大转向的基础上,美国对欧盟的战略出现一系列变化。特朗普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将欧盟视为需要驯化的“战略竞争者”而非合作伙伴,试图通过支持极右翼政党来深度介入欧洲国家政治进程,削弱其集体行动能力。欧洲极右翼同样试图利用美国势力拓展自身政治空间。但这种互动呈现鲜明的非对称性特征:美国通过输出意识形态与政治代理人持续削弱欧洲,而欧洲由于内部分化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制能力。欧洲若不能在技术主权、政治团结与制度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其在跨大西洋关系结构中 will 陷入依附性位置,进而沦为美国地缘战略附庸。在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中,传统上依靠自由民主共识、多边机构和规则维系的西方秩序,正在被右翼民粹主义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所替代。^①由大西洋中间派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共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面临更大挑战。

(三)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瓦解

特朗普对欧洲内政的深度干预与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势力的联动,正在系统性冲击二战后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依托多边制度框架,构建了全球治理的规范性结构。该体系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确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治理范式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②冷战结束后,该秩序加速空间延展,但深层次的结构张力持续发酵: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催生全球经济治理的多极化转型,西方中心主义的规范体系与非西方世界的文明传统形成的价值对冲都对其构成了冲击。尽管面临诸多挑战,该秩序仍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然而,近年来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崛起与互动正在触发深层次的秩序重构,从制度架构到价值内核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了系统性冲击。

首先,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旗号,与欧洲极右翼政党在经贸领域形成破坏性联动,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经济根基构成一系列冲击。特朗普政府实施系统性保护主义经贸政策:一方面通过加征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退出多边贸易协定等保护主义手段重构供应链体系,防止产业外流;另一方面频繁实施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采取多种胁迫性工具迫使企业改变全球布局。欧洲极右翼力量长期以来积极响应特朗普政府的“去全球化”议程,不仅敌视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还要求采取更激进的经济民族主义举措,并对本国的产业实施更多

^① Frederico Seixas Dias, “From Realpolitik to realism: the American reception of a German conception of politic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 46, No. 4, 2020, pp. 405–419, here pp. 411–413.

^② John Ikenberr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discontents”, *Millennium*, Vol. 38, No. 3, 2010, pp. 509–521, here pp. 510–513.

的保护性措施。^① 这一政策转向的实质是把本土主义的政治逻辑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其目标在于解构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全球分工的自由贸易体系。其寻求产业回流的保护主义举措可以给极右翼政党带来短期民粹红利,但也会诱发对经贸体系的制度性信任危机,使得全球经贸治理区域化、阵营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其次,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对全球多边治理体系构成巨大冲击。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就已带领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议》(Global Compact on Migration)等。在2025年1月20日其第二任期就任首日,特朗普再次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再次退出《巴黎协定》。^② 美国作为多个国际组织最大的会费缴纳国,其退出直接导致相关国际组织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严重冲击了传统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特朗普的“退群”行动也产生了显著的破窗效应和示范效应,为欧洲极右翼政党鼓吹退出多边机制或对国际义务进行选择性地履约提供了“合法性”样板。欧洲极右翼势力借“主权回归”的右翼叙事解构欧盟超国家机制,从意大利联盟党要求重审欧盟预算规则,到匈牙利欧尔班政府拒绝执行难民配额公开挑战《都柏林公约》,极右翼力量的一系列行动不仅影响欧盟决策效能,更使得欧洲作为区域性多边主义标杆的示范意义被逐渐消解。^③ 美欧右翼的协同行动导致传统的多边治理框架陷入功能性瘫痪,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难民等议题上的合作将面临更大的阻碍。

最后,美欧极右翼势力的互动中的民粹主义话语体系系统性地解构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依托的价值共识与制度架构。在价值观念领域,美欧右翼政治力量刻意强化身份对立、煽动排外情绪与解构多元包容理念,将移民潮、文化多元主义议题刻意渲染为“文明冲突”,借助带有强烈排他性的民族国家叙事,解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依赖的所谓“普世价值”。^④ 在制度层面,美欧

^① Gilles Ivaldi/Oscar Mazzoleni, “Economic populism and producerism: European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Populism*, Vol. 2, No. 1, 2019, pp. 1–28, here pp. 6–13.

^② Christian Edwards, “What i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why does Trump want to leave it?”, CNN, 2025–01–21, <https://edition.cnn.com/2025/01/21/world/world-health-organization-trump-withdraw-explainer-intl/index.html>, 访问日期:2025–04–04。

^③ Ana P. Santos, “Poland and Hungary oppose EU’s proposal to reform asylum policies”, *Infomigrants*, 2023–06–12, <https://www.infomigrants.net/en/post/49603/poland-and-hungary-oppose-eus-proposal-to-reform-asylum-policies>, 访问日期:2024–04–03。

^④ Daphne Halikiopoulou/Steven Mock/Sofia Vasilopoulou, “The civic zeitgeist: nationalism and liberal values in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9, No. 1, 2013, pp. 107–127, here pp. 111–113.

右翼民粹力量将多边治理体系污蔑为“全球主义精英操控的工具”。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为口号,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商机制,以削弱现有国际治理机制的权威性与执行力。^①此举不仅在话语层面制造了针对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信任危机,更在实践层面直接削弱现有治理机制的权威,使得自二战后逐步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价值共识崩塌与制度框架瓦解的双重挑战。

特朗普主义与欧洲右翼的合流,本质是通过“内部分裂”与“外部施压”的双重杠杆,将国内民粹议程升级为国际秩序重构的方案。这不仅瓦解了美欧传统同盟的经济、安全与意识形态支柱,更可能诱发全球权力结构的链式重组,使得二战后建立的以多边主义、规则优先和多元民主共识为特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存续性挑战。美欧右翼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怀疑态度,削弱了西方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规则等全球议题上的传统合作意愿与领导力,导致政策协调难度增加,使得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集体行动能力出现显著下滑。但是,由此造成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力赤字”为中国、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改革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创造了机遇。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发现,美国右翼民粹力量与欧洲极右翼势力的跨国互动正呈现显著强化趋势,且这种右翼跨国合流现象的形成具有多重驱动机制。在意识形态层面,美欧右翼在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等议题上有着深刻共识,均在崛起进程中采取相似的民粹主义动员策略。在战略层面,美国右翼试图通过扶持欧洲极右翼势力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以此服务于大国竞争战略;而欧洲极右翼则试图借助已经占据权力中心的美国右翼的公开站台背书,提升自身国际能见度,从而突破执政的“天花板”。这一互动模式显示出的一系列新特质——干预与渗透的公开化、技术民粹动员和“私人网络化”的非正式联盟——都推动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频度、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

美欧右翼民粹主义构筑的新型互动网络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不仅加剧了欧洲内部的政治极化,还使得美欧传统的交往体系面临一系列重塑的压力,同时也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使传统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受到极大的挑战。但这种互动的深入也面临一系列阻碍。德国主流政党虽在移民等问题上被迫与德国选择党有限合作,但仍坚守“警戒线”拒绝联合执政,凸显了欧洲传统精英对

^① Michael Vaughan/Annett Heft, “Anti-elitism in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61, No. 1, 2023, pp. 76–94, here pp. 80–85.

极右翼势力扩张的警惕。^① 德国街头数万人的反极右翼抗议、特斯拉销量锐减和欧洲多国对万斯言论的集体反击,表明美国对欧洲内政的干预反而可能激发更多欧洲中间派民众的反感,推动建制派力量的内部整合。^②

此外,新时期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的互动基础也有着深刻的悖论。一方面,他们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敌视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通过构筑互动网络抵制文化多元主义和多边治理框架;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全球化失衡的产物,右翼民粹力量的跨国话语共振和政策协同反而极为依赖互联网、社交平台等高度全球化的基础设施。这种悖论使得跨大西洋右翼民粹联盟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反全球化,也非单纯的国家主义回归,其行为实质是试图通过重构私人权力网络,将全球化改造成服务于右翼议程的可操控体系。因此在未来,如果右翼民粹力量能够找到更好的整合路径,那么就可以既拥有科技资本的技术赋能,又保持着本土主义的动员效能,由此可能催生出比 20 世纪法西斯主义更具适应性的威权变种。然而,右翼民粹运动本身潜藏的具有极强惯性的本土主义倾向又可能使得这个新生的“右翼联盟”面临巨大的分裂危机。例如,部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执政之后的立场转变与妥协,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失控,最终都可能造成极右翼的大部分全球议程无疾而终。对当前政策实践者而言,只有建立数字时代的跨国监管框架、防范技术寡头与民粹势力合流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才能更好地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责任编辑:郑春荣

^① “CDU and SPD start talks in bid to form next German government”, *Euronews*, 2025-02-28,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2/28/cdu-and-spd-start-talks-in-bid-to-form-next-german-government>, 访问日期:2025-03-03。

^② Camila Domonoske, “Data show Tesla sales declined sharply in Europe”, *NPR*, 2025-02-27, <https://www.npr.org/2025/02/27/nx-s1-5311609/tesla-sales-europe>, 访问日期:2025-03-03。